

# 一位北大教授在山东曹县的意外发现

2021/05/20 信息来源：文化纵横  
文字：邱泽奇 | 编辑：陈家琪 |

导读：近日，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在互联网意外走红，“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我国四大城市：北上广曹”等段子风靡一时。段子背后，是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乡村振兴成果：曹县从一个贫困县，崛起为年入160亿、遍地富豪的“网红县”，仅用10年时间。曹县的案例，到底有何特点？它对中国乡村振兴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本文指出，中国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文章以山东菏泽曹县丁楼村的电商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革命性”变化：电商崛起吸引的返乡创业人口，正在重塑整个乡村的秩序。首先，是电商突破了地理条件的限制，为小乡村创造了大市场，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起一个更为开放的线上线下互动的经济秩序；其次，虽然基于孔孟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仍在，但电商让资历与能力分离，形成乡村社会秩序“能力权威”与“资历权威”的“双权威”格局，使年轻创业者成为备受尊敬的“新乡贤”；最后，电商克服了乡村振兴中常见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各怀目标、各行其道，即“三秩并行”的弊端，有效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大局，扮演起关键的组织者角色，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政策保障，从而使政治、经济、社会“三秩归一”。

本文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 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 ——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

围绕产业兴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有过多种努力，如：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现代农业等。在一些地区，这些努力的后果之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竞争失利，农村大量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外出谋生，让乡村的经济生活依赖于外出打工的人口，让乡村的社会生活变成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的世界。为解决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各地政府也尝试多种政策和措施，譬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送项目下乡、送资金下乡，却因多种原因如缺少实施项目的人才、缺少适用劳动力、难以让留在农村的人口加入其中等，而收效有限。由此，在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各自有自己的目标，各自沿自己的逻辑运行，“三秩并行”，无法形成乡村发展的合力。

我们也发现，另一些地区同样经历了乡镇企业的衰落，却依靠发展电商吸引外出打工人口返乡创业，进行劳动再分工，有效地创造了新的产业或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兴旺。与此同时，外出人口的返乡让曾经残缺的家庭归于完整，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人们重归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和谐，村庄红火。在电商发展中，地方政府关注农户的需要，为他们解决难题、提供指引、提供政策保障，让地方政策与政府行政服务于乡村发展，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简言之，乡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都围绕乡村发展这一目标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和协作，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有序、政治有为的“三秩归一”乡村秩序，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景象。

本文希望通过山东省菏泽市电商发展的案例分析，探讨政府、社会、市场三股力量如何影响乡村发展，并在其中形塑了怎样的秩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体制机制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呈现？

### 案例：菏泽市的电商发展

在中国，一个村庄总是更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为理解村庄实践的环境，我们先对菏泽市做一简要介绍。

菏泽市地处鲁西南，人口超过800万，是山东省人口第四的地级市，也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地级市之一。在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叠加发展的中国交通网络中，菏泽的交通并不方便。从北京直达菏泽的火车需要运行近8小时，即使采用铁路加公路的模式，也至少要花费5小时，还不包括等待的时间。从菏泽到达最近的港口青岛港的时间则需要10小时。

中国多地的发展经验表明，交通是影响物流和人流，进而影响产业兴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菏泽市的发展严重受制于交通不便，加上菏泽市深厚农业传统的路径依赖，使其直到如今依然是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的最后一位。

## 最新新闻

- 17 2021.08 2021首届中国抚州文创生态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举行
- 17 2021.08 同心共筑 医者担当——北京大学举办庆祝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暨首部观察型行医纪录片《心外纪事》交流会
- 15 2021.08 法学院赴浙江省开展“赓续红色基因 把握时代脉搏”主题思政实践课程
- 14 2021.08 2021年全国核能材料暑期学校举行
- 13 2021.0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111”人才学科规划——中青年学术骨干座谈会

## 专题热点

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乡村的“三秩归一”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得以形塑起来的。

## 市场构建的经济秩序：创新创业、产业兴旺

与曾经讨论过的海梅村一样，丁楼村也是一个普通村庄，2013年以前被淹没在菏泽市众多的村庄之中，名不见经传。在阿里研究院2013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中，丁楼村一举成名，成为菏泽市的两个淘宝村之一，引起了多方注意，变得不再普通。

丁楼村地处菏泽市曹县大集镇。在电商发展之前，除了农牧业和小商业外，村民们的生计几乎没有其他来源。为了谋生，村里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选择了外出打工。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2010年以前，(村里)没有什么年轻人，连年轻妇女都出去打工了，附近村镇的加工厂招工都招不上。

2009年，事情出现了转机。村里的葛秀丽到部队探亲期间初学电商技能，回到丁楼村开了村里的第一家网店，销售影楼服饰。那时，丁楼村生产影楼服饰的屈指可数，葛秀丽卖的产品主要来自邻村一个从乡镇企业年代就开始的产业。

丁楼村民的居住布置为东西走向，葛秀丽家住在村西头，马路在村东头。为发货，她每天必须蹬着三轮车穿村而过。三轮车上装满的货物，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纷纷上门探个究竟。在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没有可以守住的秘密，葛秀丽开网店的事儿很快便在村里传开了。

第一个跟着学开网店的是葛秀丽的好朋友周爱华。周爱华在工厂上班。在学开网店中周爱华看到了机会，2010年她干脆辞掉工作，回到了村里。接着，做影楼产品销售的丁培玉不再走村串户，开了自己的网店；中专毕业、在外打工的任庆方也返乡开店做起了电商；大学毕业在公司写代码的任安普也返乡创业。电商就这样在丁楼村迅速传播开来。丁楼村的电商丁培玉告诉我们：

2010—2011年那个时候，在我们丁楼村搞电商，搞一家火一家，搞一家就成一家。(乡亲们)也都不保守，你跟我说，我跟你说，你怎么开店的，我怎么开店，就是你不会开店，我都可以帮你开店。

从销售影楼服饰开始，丁楼村的电商从客户反馈中捕捉到了市场对表演服饰的需求。影楼服饰和表演服饰在产品特征上具有相似性，可市场却有很大的差别。影楼服饰的需求量相对较小，即使在网卖，无论是照相馆还是个人，一个买家通常只会买一套。表演服饰则不同，购买者常会以表演团体为单位购买，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影楼服饰。于是，丁楼村的电商从影楼服饰销售转向表演服饰的销售和生产，曾经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纷纷加入表演服饰的销售或生产。就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在丁楼村诞生了。

市场需求与产品生产之间的正反馈，促进了产业规模的迅速发展。从销售中获得了资金积累的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纷纷转向生产；已经有了生产的农户则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建立与销售模式更加一致的生产模式。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让产品之间展开竞争。为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部分电商便转向专门产品品类的销售与生产，即“爆款”。如此，在市场规律的驱使下，多品类的销售与生产便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专业化的销售与生产。从儿童表演服饰的单个品类到戏曲表演专门服饰，丁楼村表演服饰的销售与生产在短短的三四年内便进入产品细分的专业化阶段。

产品销售与生产的专业化，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专业人才开始聚集到丁楼村，家住河南省民权县的张付传先生之前在广州市一家服装加工企业做裁剪主管。由于家中老母亲生病，2016年4月，他辞去了广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除了照顾母亲，他还来到了丁楼村。先是在一家生产企业里帮工，11月，他便在丁楼村桑万路东租下一个店铺，购买电脑制版和自动拉布机等设备，自己挂牌，经营起了服装制版裁剪的生意。除了制版，设计、印花、裁剪等专业人才和经营活动也正在向丁楼村或大集镇聚集。

2016年之前，丁楼村的电商每年都要花一段时间专门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镇采购布匹，到浙江省义乌市的小商品市场采购辅料和配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丁楼村对原材料和辅料需求迅速增长。原材料和辅料的生产厂家看到了在丁楼村的市场，采用代理或直营模式在丁楼村开设专营或直营店，甚至非专业市场的厂家也来到丁楼村开店设厂。

图1呈现了丁楼村电商的发展变化。2010年，在24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只有6户；在被授予淘宝村的2013年，在272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也只有95户；到2014年，在28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农户快速增加至210户，在2017年31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增加至280户。随着电商经营农户数量的增加，电商经营额也快速增长，2013年只有5000万元，到2017年便增加到4亿元。受丁楼村的影响，电商经营在大集镇、曹县迅速扩散。以大集镇为例，2013年只有丁楼村一个淘宝村，2017年32个村子都变成了淘宝村。从2013年到现在，大集镇吸引了500多名大学生和5600多名外出务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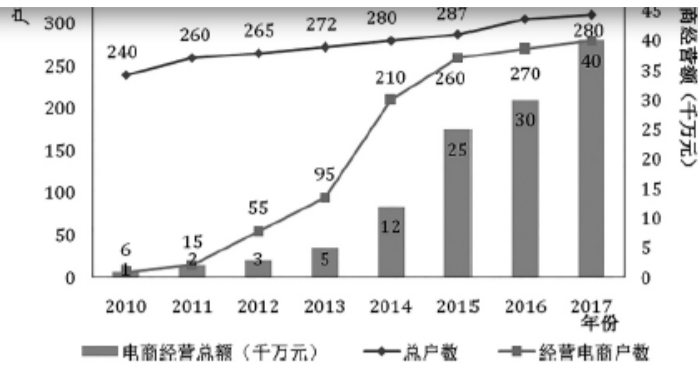


图1 丁楼村电商发展格局

由一根网线连接的丁楼村,不仅形成了表演服饰生产与销售产业,还在形成从原材料辅料供应、产品设计创新到制版、裁剪、生产、销售、运营这样一个十分全面的产业格局,出现了非常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市场中诞生,也在市场中迭代。市场的主体正是丁楼村的农户。曾经的农民获取市场需求、依据市场需求更新产品、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他们适应差异化市场需求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市场的崛起彻底地改变丁楼村、大集镇、曹县乃至菏泽市乡村的经济秩序,促使它们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创新创业转型,在没有非农产业基础的大集镇形成了销售和生一体化、相关产业的聚集化、上下游产业生态化;在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正在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有出口产业基础的乡村,也在推动出口企业的转型和升级。

反观传统小农的乡村,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为内部市场,正如施坚雅和黄宗智曾经论述过的那样,这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而在类似于海梅村的乡村,看起来是一个内部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市场的开放性使得针对内部提供的就业机会因其低收益而失去吸引力,乡村劳动力更愿意通过外出打工来获得更大的收益,由此形成了内外分离的市场秩序。

丁楼村电商发展形成的显然是另一种经济秩序。互联网连接的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开放市场,与市场规律相悖的经济行为只能被市场淘汰,与市场规律一致的经济行为才会获得市场的青睐与支持。无论是产品市场、销售活动,还是劳动力市场,我们观察到的,无不体现为丁楼村民可以理解并实践着的市场。正是遵循了市场规律,才让丁楼村呈现出产业兴旺的景象。

人口返乡的社会秩序: 家庭和谐、乡风文明

在海梅村,我们观察到宗亲关系是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师徒关系、同行团体也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可是,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在节庆之外的时间,村庄的社会秩序是残缺的,是由乡村政府维系着的社会秩序,即代理人秩序。在丁楼村,其社会秩序曾经也与海梅村一样。

不同的是,随着外出打工人口返乡,随着电商的发展,丁楼村开始呈现另一种社会秩序。外出打工是中国欠发达乡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外出打工一段时间以后,返乡创业的现象也不只出现在丁楼村;丁楼村的特别之处正是其传统的家庭文化与返乡创业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

菏泽市紧邻孔孟之乡,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庭秩序传统。与一些乡村不同的是,人们返乡创业的驱动力不仅在于经济收获,更在于家庭责任的驱使。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段时间,子女到了受教育的年龄,父母亲也老了,到了要赡养的年龄。回到家乡创业,既可以为子女接受教育营造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也有机会照顾年迈的双亲。

可是,亲情的维系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运用电商创业的返乡人其实面对众多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创业成本。要想做好电商,既需要独到的产品,更需要周到的服务。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电商服务,都需要劳动力。如果父母不参与子女的创业活动中,子女就得雇人。雇人,既意味着增加成本,也意味着推高失败风险。为了帮助子女创业,父母主动加入产品生产和电商服务之中,形成了一家人都参与电商创业的格局,不仅降低了子女的创业成本,更是在家庭内部形成新兴的代际分工。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新的代际分工还发生在村庄层次。在鄄城县我们观察到,一些企业聘用老弱病残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留守员、中老年,一天能挣上百元”的现象。

传统的代际分工是父母向子女传授经验,不仅形成劳动力的数量增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中维系了父辈的权威性,让年龄、资历与能力建构的社会秩序方向一致,形成了费孝通说的“长老统治”,也是人们对中国乡村传统秩序的最熟悉的想象。

新的代际分工则是子女提供机会,让父母充分施展能力,形成两代人之间能力的互补。如此代际分工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也不同于代理人的社会秩序。在丁楼村的社会秩序中,传统的尊老爱幼秩序形式依然存在,可形式背后的内容却截然不同,父辈的资历依然是其社会权威的来源,可“能力”不再是权威的来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任庆方2010年回家探亲期间听说村上有人开淘宝店,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得更好。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会比在外打工赚得更多,而且还能照顾家人。

于是他回到了丁楼村在网上做起了影楼服饰生意。2012年,任庆方又凑了13万元开办了服饰加工厂,自己生产。2013年销售额达到60万,还开了天猫店;2015年近300万。2014年他被共青团曹县县委授予“十佳创业青年”称号,共青团菏泽市市委还将其树立为农村电商青年创业典型。任庆方的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丁楼村电商学习的对象。任庆生就是其中一位。

论年龄,任庆生是同族任庆方的兄长;论经营电商的能力,任庆方则是任庆生请教的对象。可学习不意味着跟随,而是在跟随中创新。在学习中发展的庆生表演服饰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也销往新加坡、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等七八个海外国家。

如果不仅“能力”好,“德行”也好,后生也能成为乡村社会的“新乡贤”,任庆生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丁楼村,任庆生自己电商做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像是个“乡贤”,把自己经营电商的经验教训对村民们倾囊相授。2010—2017年,丁楼村经营电商的农户从几户发展为280多户,占村家庭户数的90%以上。2014年,任庆生被推选为丁楼村村支部书记。

因电商技术应用产生新代际分工带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既延续了中国文化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传统,又演化出用贤举能的新风尚,形成了资历与能力双驱动的社会秩序,不仅让家庭和谐,也推动着乡风文明的发展。这一发展的具体呈现是,丁楼村没有了犯罪,乡亲之间没有了争吵,城市里的广场舞也出现在了农户的家门前。

政府润泽的政治秩序：助推引领、治理有效

第三、四两节的讨论似乎在说明乡村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运行的地域共同体。事实上,不是!中国是一个有着近3000年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即使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看起来是人群自治共同体,实际上却是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地域行政共同体。只是,国家权力在村庄层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除了皇权下达,还有民意上传,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居住在乡村,却与乡村利益有着一定距离的乡绅实现的,即费孝通讨论的“双轨政治”。进入近代以来,国家权力逐步下达到村庄,却不在村庄设置政府机构,而是运用村庄代理人上传下达。在海梅村我们观察到,其政治秩序有着明显的自立性,乡土专家评定项目系政府设计,也从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内部展开,村民只是作为评定的对象,评定工作则由村干部负责落实。村级干部有着鲜明的代理人特征,评定的结果对村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没有实质影响,进而形成了双轨政治的变形,即乡村政治秩序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

在丁楼村我们则观察到了另一种乡村政治秩序。地方政府并不独立设计财政转移支付下乡的项目或计划,而是顺应农户发展电商的需要,在农户无力应对的领域和环节施展政府能力,服务和引领乡村发展。

网络是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也是村民无力企及的领域。为服务电商发展,地方政府积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资源进行网络建设。以大集镇为例,2013年4月,镇政府利用山东省光网改造试点,联合菏泽市联通公司曹县分公司,在乡村进行光网改造。2013—2016年间,大集镇的光纤入户数与网点数一直稳步增加,接入互联网的平均增长率为114%,光纤入户数增长率为129%。截止到2016年,大集全镇已有5800多户实现了光纤入户,各行政村已实现了光网全覆盖。

场地是电商发展的又一必要条件,也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关键环节。通常的情境是,随着销售的发展,村民不仅需要场地暂存产品,也需要场地进行生产。为解决场地问题,村民们能做的是在房前屋后搭建临时空间。政府则可以利用政策资源兴建地方性的产业园。

还是以大集镇为例。在注意到场地难题后,镇政府从2013年开始,一方面协调各方资源,或改造和利用村镇废弃、闲置的厂房、废旧庭院,或兴建表演服饰加工厂。另一方面,为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开展电商产业园的建设。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总投资2.6亿元,一期占地120亩,布局上采用前店后厂模式,以生产、加工淘宝表演服装为主,集网络销售、产品展示、物流运输于一体,一期工程已全部投入运营,状态良好,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带动直接就业3000余人。产业园二期建设已启动,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表演服饰加工销售集聚区。2016年,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发展项目。

技能习得是乡村发展中的又一难题。我们知道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有利于简单技能的扩散与传播,可电商是有门槛的经营活动,赋能便成为发展电商的瓶颈之一。为此,地方政府或运用榜样的力量,树立各种百姓身边的榜样,邀请

2016年,菏泽市举办的各类电商培训多达654余场次,平均一人有2场次,参加培训的达9万多人次。

除此以外,电商发展的中间环节也有政府的无形支持。还是以丁楼村为例。在销售和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企业注册、进而使企业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是丁楼村大多数电商曾经遇到的一个环节。传统的企业注册不仅手续烦琐,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更让村民摸不着头脑。为此,政府要求工商部门与公安消防、税务、金融等多部门协调,为电商创业企业搞一站式服务。2013年,大集镇党委政府专门发文,为企业注册提供优惠政策,凡需注册有限公司的,所需办理的一切证件和手续均由政府出资,派专人协助和负责办理;并专设淘宝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对电商和加工企业实行归口管理,除公安消防安全检查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该小组批准,不得向电商企业及网店乱检查、乱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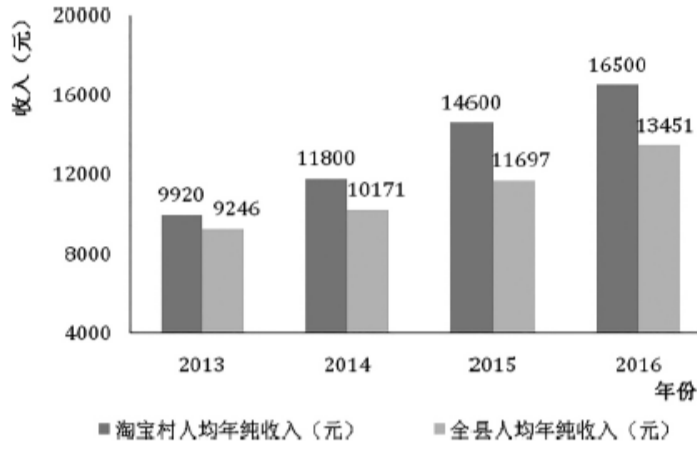


图2 曹县人均纯收入与淘宝村人均年纯收入 (2013-2016)

在丁楼村和菏泽市各区县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为发展电商,政府提供的各项直接和间接的服务,以及引导、推动、整合政策,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不过,这个清单无一例外地说明,有效的乡村政治秩序不是在权力斗争中争取的,更不是在对社会和市场的管束中强化的,而是在积极回应百姓发展的需求中而获得的,也通过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巩固和强化。

其中,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百姓支持政府的基础。以曹县为例,图2表明,2013年以来,淘宝村的人均纯收入始终高于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与此同时,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也在快速增长之中。

丁楼村的例子说明,政府服务于发展不仅是村民的需要,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抓手,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积极润泽地方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层政治秩序的发展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境。20世纪80到90年代,基层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也积极服务于乡镇企业,被称之为政府对企业的“庇护”;由于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事实上是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就是企业。不过,与乡镇企业年代不同的是,当年,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确有许多扯不清的关系,无论是在产权上还是在收益分配上,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在丁楼村,基层政府与企业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纠缠。如果一定说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都希望通过产业兴旺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丁楼村的政治秩序也可以被看作是“双轨政治”的另一种变形。与海梅村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不同,丁楼村的政治秩序既贯彻了振兴乡村的国家政策,也上传了百姓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且得到了基层政府积极反馈。政府与百姓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网络互动,我们姑且称之为“助推引领”。

结论

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历说明,社会、市场、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围绕“发展”目标,三者的认知不同、行为不同就会塑造不同的乡村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乡村振兴,让三者形成合力,则是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解决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

菏泽市曹县丁楼村的例子说明,围绕农村电商发展呈现的乡村秩序是一类迈向乡村振兴的协奏曲。

在过去100多年里,中国的确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可是中国的家庭文化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家庭文化让在外打工多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返回家乡,上赡长辈,下育子孙,把多年积累的劳动技能带回家乡创业创新,触发了乡村秩序的另一新格局。



之所以强调丁楼村,是因为这个秩序嵌在乡村的社会文化之中。其中,最要紧的是家庭文化。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中国人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子女有出息”。子女有出息的指标不在于传宗接代,而在于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指标之一就是家业兴旺。因此,发展是家庭的共同目标。尽管劳动力返乡的动力来自于赡老育小,实现返乡目标的支撑还是来自于家庭的经济发展。如此,在长辈依然拥有资历权威的同时,年青一代凭借其为家业兴旺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能力上的权威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秩序。

杨开道先生曾经认为,中国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组织。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行政发展始终的议题。在丁楼村案例中我们观察到,基层政府顺应电商发展的需要,不仅为电商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运用行政资源补足村民能力的短板、及时响应村民对政府服务的呼声;也主动发现电商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要,助力电商发展,引领电商发展,形成了一个顺应地区发展的新政治秩序。

在菏泽市的电商发展中,丁楼村是众多乡村的一个例子,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在没有产业基础的还是在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我们都能观察到,围绕产业兴旺形成了目标一致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三秩归一,这个“一”正是乡村振兴。当然,电商下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三秩归一”,譬如对村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生活方式的影响等,不过,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当另题讨论。

(作者:邱泽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文链接: [一位北大教授在山东曹县的意外发现 | 文化纵横](#)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